

高教资讯

2021年第2期（总第15期）

湖北医药学院高教研究所

2021年6月

高校人才培养专题

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须走出历史惯性

（厦门大学：邬大光）……………1

努力构建以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浙江大学：吴朝晖）……………9

坚持“五个融合” 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

（中山大学：罗俊）……………20

创新人才培养也是社会工程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管培俊）……………23

坚持“五育”并举 打造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

（厦门大学：张荣）……………26

编者：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水平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2015年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再次明确，高等学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人才培养是中心、是根本，是大学的本质属性，是大学的存在价值。本刊以“高校人才培养”为选题，集中选编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须走出历史惯性

邬大光（厦门大学）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这是人们的共识。但这个“深水区”指的是什么，似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容质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若干重大领域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一个事实，与高等教育其他领域改革相比，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并不能完全回应社会期待。“钱学森之问”之所以长期成为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诘问，就是一个明证。由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高校的人才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短板。当下有必要对我国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刻反思。

一、我国大学人才培养已成为“短板”

前不久，去世界卫生组织，见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他说世界卫生组织有 7000 余雇员，但中国雇员只有 40 余人。目前，中国每年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费大约 2500 万美元，从 2018 年开始就要交 5000 万美元。但是，我们交的钱和派出的人数相比，是典型的“代表性缺失”。他还说在 100 余个世界上的国际组织中，中国基本都存在“代表性缺失”的现象。他认为我国选派不出高水平的人在国际组织任职，关键就是人才培养质量有问题。反观日本二战之后，共产 25 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本科全部是日本本土大学毕业，在国外读硕士的只有 2 个，在国外读博士的只有 3 个。这反映了日本大学人才培养的竞争力。

无独有偶。过去三年，有幸参加了国内六所“985 工程”高校的审核评估。教育部评估中心对这一轮“985 工程”高校的审核评估，采取了一项新举措，即邀请外国学者参加。这些外国学者大部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或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些外国专家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我国一流大学的审核评估。在深入考察和评估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我国“985 工程”高校的硬件已经是世界一流，其条件之好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让他们感到震撼和羡慕。然而，当这些外国学者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听课、召开学生座谈会、调阅各种教学文件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一流大学的本科人才培养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无论是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和教学手段上，都还存在很大差距。最为突出是学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基础不够厚、口径不够宽、跨学科程度弱、国际化程度低。

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在某大学评估反馈会上的发言。他说：“贵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领袖人才、创新创业人才，这种远大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一流大学应有的担当。但不知贵校是否考虑过在二十年或者最多三十年之后，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贵校今天培养的人才能够治理世界吗？”他的话让我非常震惊，在我的认知里，至少我还没有这种意识和准备，或者说国内一流大学的管理者似乎还都没有想过这个话题，都还没有想到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具有治理世界的能力，更没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提前做些准备。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天经地义，为世界培养人才为时尚早。可是西方学者已经想到了这个命题，并且成为十分关注的话题。仅从提出这个命题的角度看，我国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观念明显缺乏超前意识。今天在读的大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二三十年后，当他们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我国有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体，但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无论是视野还是能力，显然还不具备治理世界的能力。

另一个足以引起深思的，是外国专家对中国大学课堂教学的观察。2016年在某大学评估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副校长在听了几节课之后说，她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一流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互动如此缺乏，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此种现象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和批判能力？当我们问她什么是好的课堂教学时，她给的答案是：大学课堂教学有五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安静（silence）”，即课堂上很安静，学生不发言；第二重境界是“回答（answer）”，即老师课堂上提出问题，学生们只回答对或不对，是或不是；第三重境界是“对话（dialogue）”，即老师与学生之间有一定的互动；第四重境界是“批判（critical）”，即学生会对老师的讲授内容提出质疑；第五重境界是“辩论（debate）”，即学生与老师互相反驳。虽然在审核评估专家听课时，课堂的教学效果比平常好，但显然与外国学者希望看到的还有很大差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众多，这些外国学者也给出了部分答案：即我国的一流大学对科研的重视远远超过教学，我国的一流大学普遍还没有感觉到人才培养的压力，还没有深刻体验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诚如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在某大学反馈会上说：“我相信中国一流大学的科研指标在国际社会的各种排名榜

会上会持续上升，但是中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不同步。一流大学必须认识到，当其科学研究达到一定水平时，人才培养就成了核心竞争力。”他们普遍建议：在中国一流大学的硬件已经得到明显改善的背景下，必须要重视人才培养，只有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引领作用的大学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才可以称得上是一所卓越的大学。一位几次参加评估的外国学者指出：中国的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似乎有许多亮点，但都是在模仿国外大学的做法，没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尽管这些外国学者对我国一流大学人才培养上的评价有些“尖刻”，但指出要害，具有深刻的“预警”意义。

二、对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

前不久，厦门大学迎来了教育部口腔医学专家组，考察我校是否具备举办口腔医学专业的条件。由于汇报人对口腔医学与“牙科”的概念不清，在汇报中，经常会用“牙科”这个概念，该组长纠正说，在中国，这个专业不能叫牙科，只能叫口腔医学。问她为什么？牙科和口腔医学有什么区别？该组长以扫盲的口吻说：牙科是欧洲和北美的称谓，口腔医学是苏联的称谓，这一提法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就已经明确。

事实上，不仅仅在口腔医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量概念中，有许多称谓和制度设计都来自苏联，例如专业、教学计划、教研室制度等。但是今天，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人们发现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概念，在翻译时似乎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单词。以“专业”这一概念为例，翻译成英文可以有“program”“major”“minor”“specialization”等不同译法。不仅仅在称谓方面，在对外交流中，很多高校在自我介绍时，常会亮家底似地提到学校有多少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多少个国家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这一介绍有时会让国外专家很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此种现象既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有关，也与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解和认识有关。但其中，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和惯性是一个重要原因。

回眸历史，上个世纪 50 年代，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这种改造从宏观管理体制到微观教学领域，几乎无所不在。从大规模院系调整为切入点，形成部委举办高等教育的格局，直接对接国民经济发展

需求；在中观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上，建立了以学校-系-专业-教研室的教学组织体系；在微观教学体系上，从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直接采用苏联蓝本。根据当时《人民日报》的一份资料，到 1956 年底止，苏联专家们已编写教材 629 种，帮助中国教师建立实验室 496 个，资料室 192 个，实习工厂 34 个。到 1957 年上半年止，苏联专家为中国培养研究生和进修教师 80285 人，专家们开课课程或帮助基础薄弱课程开课 899 门，指导中国老师讲授的课程 443 门。再以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自 1951 年后，苏联专家为该校建立了 19 个专业，讲授 151 门课程，编写讲义 66 门，建立 68 个现代化设备实验室，培养 577 名研究生。再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1957 年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 140 多门课程中，有 100 多门课程的教材、讲义是苏联专家编写，该校的一千多名教师中，有 700 多人直接或间接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培训。

可以说，苏联教育模式奠定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今天人们熟知的高校组织架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教学工作量制度、教学编制等众多最为基本的教学管理制度，都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但在人才培养和教学领域深处，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其中两个方面尤为明显：一是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二是高度专门化的教学体系。

其一，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思想，1954 年，我国参考苏联高校的专业目录制定了第一个国家专业目录《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这一专业目录问世后，经过历次修订，不仅成为高校设置专业的指南，同时也是国家制定招生计划、就业计划的重要手段，也成为高校配置资源、安排教师、课程、建立实验室的依据。这样，专业目录从原来的知识分类变为行政管理手段。其二，为了迅速高效地培养行业急需求人才，全国以专业为单位，推进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甚至统一教学管理，由此在全国高校形成了非常一致的专业教育模式。而在高校内部，以专业为单位建系，以系为单位组织教学和管理，形成了专门化的教学体系。从二者关系而言，专门化教学体系适应了当时集权计划经济的发展需求，而集权的计划模式又强化了专门化教学体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办大教育的国家，高度计划的专业教育模式无疑培养

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急需人才。但当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正从传统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将起决定性作用时，当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式模式和过于专门化的教学体系，就会显得与现实有诸多不适，这些不适需要从源头上进行反思：

其一，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反思。过去一直强调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但在我国强调社会转型、产业升级、提倡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们正在面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职业的匹配度不断下降的现实，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强调专业与就业的对口？强调还是说需要从终身教育的视角审视我们的人才培养问题，调整与改革专门化教育的目标与模式。

其二，关于专业体系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专业体系是学科知识体系的一个“横断面”，需要从不断变动的学科知识体系截取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组成专业。对于一个科技文化水平处于相对落后的国家，依赖于一种相对稳定的专业分类，对于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无疑起到稳定和保障作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且需要突破时，就不能完全被人为的学科专业体系限制。特别是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推动下，新兴学科专业、交叉学科的强劲需求已经对传统专业模式提出挑战。这种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固守某些传统，还是需要回归学科专业之本来面目？

其三，关于教学过程的反思。传统专业教育模式说到底，就是把教师安排到各个专业生产线，并以集约化的班级授课进行知识传授。但在今天，学生的多样学习需求以及知识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传统这种知识导向的传授方式已经暴露出它天生的缺陷。因为今天，社会需要的是一种能力标准，一种尽快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是一种增值的价值观。这种转变，需要大学给予学生更多的个性化帮助，需要整个课程体系与教学过程转移到学生的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上。

其四，大学组织体系的反思。基于大学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我国高校在照搬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建立了学校-系-专业-教研室为基本框架的教学组织体系。但这一体系在强化科研的过程中，人才培养的功能遭到弱化，大量新型的科研组织不断涌现，使得大学内部的治理体系已经异常复杂，甚至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职能组织正在遭到不断“撕裂”，新型教学组织的建立已成为当务之急。如

何回归大学本原，从最根基上建设现代大学教学组织和制度，这既是一个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基本价值判断。

三、走出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的需求，我国大学人才培养一直试图突破苏联体系。自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后来的院校合并，解决了单科性大学以及中央部委举办行业大学的弊端；高校招生就业体制改革推了动高校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高校内部进行的校院二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奠定了外部条件。与之相伴随的改革还有大类招生、分类培养、主辅修制、拔尖计划、甚至设立本科生院等等。但客观地讲，尽管高校在外部管理体制、招生就业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在人才培养的这个根本问题上，高校推进的许多改革都是在原有体系上的修修补补，都没有跳出原有的苏联框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原有的教学体系。

以学分制为例。我国从上个世纪 80 年初就开始学分制改革，但时至今日，学分制仅仅是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存在，并没有真正触及学分制的本质：即学习自由，包括选课自由、选专业自由以及选择学习进程自由。根据我们课题组对全国 718 所高校抽样统计，各高校学生转专业人数占在校生人数平均不到 2%，占招生数的比例也只有 7.4%。根据对全国 820 所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抽样统计，分别平均达到了 97.75%和 96.90%。而与美国高校相比，排在前 50 名高校（national university）六年毕业率平均只有 89.7%，而排在 51-100 名高校（national university）六年毕业率平均只有 56.2%，当然，如此之低的毕业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教育大国，不一定合适。但是，如此之高的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也不是学分制要达到的目标，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学分制还是一种“皮毛”。又如，多年来一直倡导宽口径、厚基础，但实际上，高校的学科专业的壁垒依然存在，专业设置越来越细，课程开设越来越专，课程结构越来越僵化。究其原因，乃是在计划思维下，学科专业体系已经变成一种行政体系、变成一种资源配置体系、变成一种学术组织体系。这些例子说明，尽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用人环境发生变化，因之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在变化、就业体制也在变化、宏观行政体制在变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在变化，但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教学计划、课程方案、

尤其是大学课堂的教学模式却相对滞后，或者说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所以未能发生变化，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外，大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百年史，民国时期的大学主要是学欧美。比如蔡元培是从德国回来，因此北大的理念就是当时德国大学的理念；梅贻琦是从美国回来，因此清华大学主要是美国模式；厦大首任校长林文庆是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来，因此厦门大学有点像英国大学的模式。建国后，全盘照搬苏联，原来的欧美体系淡出了我国大学。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并没有号召学习北美的教学模式，但是我们的大学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向美国靠拢。可是没有想到，北美的教育模式与苏联的教育模式是二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例如，重修制度是学分制一个重要特征，补考是学年制的另一特征。但只有我国，在既有重修和补考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毕业前的“清考”现象，使“清考”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上一种独有的考试制度。这一现象说明，传统习惯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常常制约或束缚着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发展。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模式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向美国模式靠拢，但从现实看，骨子里还是苏联模式在发挥作用。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在苏联教育模式下接受教育的，我们也自然地传承这一模式，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依然被禁锢在苏联模式中。这种历史惯性包括：课堂教学惯性、专业教育惯性和学科教育惯性。这种惯性已经被模式化和固化，且进入了集体无意识状态。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从进入大学起，就被绑在某门课程上，被绑在某个专业上，被绑在某个学科上。当一个大学老师被这样过分“专业化”后，这个学校的跨学科水平，这个学科的跨学科水平，这个专业的跨学科水平，包括这个老师的跨学科水平，一定是低的，也无法保证通识教育的高水平开展，更遑论培养出来的人才如何具有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从这一意义上说，走出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就是要走出苏联模式，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教育强国的大势所趋。

当然辩证地讲，苏联模式给我国大学教育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例如教研室制度、实习制度等等。所以跳出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抛弃一些优良传统，相反，

我们更希望在改革进程中必须深刻认识这些历史惯性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从远的方面说，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一直没有离开科举考试的阴影。从近的方面来说，我国的人才培养一直没有摆脱苏联的阴影。实际上，世界上的大学有三种体系：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和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体系。当英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时候，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跟着他走。美国最强大的时候，都在跟着美国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跟着走。追溯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作为后发外生型发展模式的中国高等教育，过去也一直倡导洋为中用，但在国家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大学更多是采用一边倒的全盘接收。殊不知，当年学习苏联是因为冷战格局的驱使，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产物。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一流大学对世界的高等教育影响不仅仅在科研方面，更能体现引领世界潮流的，往往是教育制度创新。其中典型的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书院制、哈佛大学的选课制、德国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相比之下，我国自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以来，科学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视，且收到了显著效果。但人才培养似乎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仅从当前国内一流大学招聘人才的要求来看，几乎都聚焦在具有留学背景的“海归”身上，尽管人们也在反思一味追求“洋标准”的负面影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流大学对自身人才培养的不满意，或者说不够自信。教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今天当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的是全球化的大潮，伴随着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的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一定要大学走出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高等教育战线不仅要自我觉醒，意识到自身的软肋和不足，还要意识到要培养引领世界的人才就必须跳出原有的人才培养体制与模式。总之一句话：大学必须守住人才培养这个根。

——本文来源：南方教育在线

努力构建以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吴朝晖（浙江大学）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人才培养质量是关系学校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大学教育教学面临的环境急剧变化，人才培养的核心要求转向德才兼备、全面发展，高校迫切需要转变培养理念、目标、模式、方法，构建起适应时代的一流教育教学体系。

一、全人教育与质量建设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

（一）当代高等教育发展新思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正在加速汇聚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机器革命向纵深推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社会深刻转型。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正孕育着革命性的转变，世界各国纷纷对传统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全人教育、终身教育的理念逐渐成为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潮。

1. 全人教育。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全人教育思潮一经兴起，就迅速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教育改革运动。全人教育反对将工具性目的凌驾于个人发展目的之上，倡导充分发掘学生的潜能，使人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发展。

全人教育的理念下，高等教育的各个要素与环节都将发生重大转变。在教育理念方面，更加重视学生的全员化和整体性发展，强调树立多元化、多样性的质量观。在培养目标方面，更加推崇国际化技能培养，特别是学生全球视野的拓展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深度融合。在培养模式方面，局限于特定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被打破，通专融合的教育特色日益彰显。在教学方法方面，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开放式、个性化学习备受肯定，大规模开放的网络课程（MOOC）、学习分析技术等推动高等教育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在教育评价方面，更加注重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性评价，评价标准从单一向综合转变，要求更加全面、多维地评价教师和学生，改进课堂教学评价成为评价方式改革的重点。

2. 终身教育。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终身教育思潮一直是世界教育发展

的重要议题。终身教育理念打破“人一生中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正规学校教育”的传统观念，认为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的生命始终，通过全时空覆盖的教育活动，促进人多方面的终身发展和人格完善。

终身教育理念下的教育，从相对集中于一个时段、有限空间、以学龄期为主的活动，转变为了覆盖每一个人的人生全时空的活动。终身教育的目标在于使人养成学习的习惯，获得继续学习所需的能力，以适应个人在各个方面、各种范围的需要并且能够应对各种新的挑战。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2030行动框架》，认为受教育权自出生那一刻起贯穿人的一生，提出了“以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为总体目标。

（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新动向

伴随着科技创新带来的时代巨变，人才资源日益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争夺对象。今天的人才质量将转变为明天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国家的创新力、竞争力。因此，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极大关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与各类大学纷纷出台改革举措，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出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价项目（AHELO），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高校教育评估的核心内容，通过对毕业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估来判断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以此指导高校改进教学。英国教育部于2016年发布名为《知识经济体的成功——教学卓越、社会流动及学生选择》的高等教育白皮书，提出教学卓越框架（TEF），强调以学生为核心提升教学质量，把大学的经费与教学质量挂钩。《华盛顿协议》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核心理念，开展国际实质等效专业认证，推动工程教育改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等也将质量作为核心，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改进。

面对高等教育变革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顶尖大学也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创新，斯坦福大学于2012年发布《斯坦福大学本科生教育研究》报告，提出通过革新通识教育模式、整合学习经历、拓展学生自由度，培养具备广博知识、基本能力、多元文化认同感、社会责任感以及适应性学习能力的卓越人才。2014年，斯坦福大学提出了极具前瞻性与创造性的《斯坦福2025计划》，从开环教育、自适应教育、轴翻转、目的性学习4个方面设想未来的教育，提升学习体验，对未来的教

育变革进行持续性探索。其中的开环教育计划将本科学制从4年改为6年，学生录取年龄不限，没有规定的毕业时间和限定的专业，学生也不需要一直在学校里接受课堂教育，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进入社会工作或者回校学习。为此，斯坦福大学将打破传统的课程与学生结构，创新录取方式和教学模式，建立基于能力的学习平台，打造带有使命的学习目标，从而构建更具活力的教育和学习环境。

（三）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新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对教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明确提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出了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和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三项基础性工作要求。

全国教育大会进一步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求高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2018年10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对高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升本科教育质量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目前，“双一流”建设进入了关键阶段，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已成为高水平大学改革发展的共同选择。国内各高校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均在积极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更加注重学生的自由选择度和多样化成长，更加强调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与价值塑造的并重，更加鼓励授课方式与教学方法的创新，更加关注人才培养与学校办学特色的紧密结合。

二、以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导向审视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

着眼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高校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以更新的理念，用更宽的视野，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成效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阶段。2017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

学校 2631 所，培养了本专科毕业生 735.83 万人，毕业研究生 57.8 万人。2017 年全国高校在学总人数 3779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5.7%，而 1978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228 万和 2.7%，四十年间增长了近 16 倍。在规模增长的同时，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也在逐步提升。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2016 年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我国高校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人才培养质量显著增强，特色发展势头强劲，校内外联合培养和协同育人已见成效，学生与社会用人单位对高等院校的满意度较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全国各地各类高校向各行各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与智慧支撑。

然而，对照国家的需求、人民的期待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与质量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5 个方面。一是教育认知有待提高，部分高校尚未牢固树立育人的中心地位，重视教育教学的内在动力需要进一步增强。二是通识教育、专业培养模式还不够完善，研究生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分类培养机制仍需健全。三是教学方法有待改进，互动式、讨论式教学有待进一步推广，研究性、探究式学习缺乏引导，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四是责任体系有待重塑，高校、院系、学科、部门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权责不够清晰，院系作为基层办学主体的地位仍需进一步强化。五是质量保障有待增强，覆盖培养全过程的质量跟踪体系尚未形成，基于学习效果的课程质量“反馈-改进”机制尚未建立，多维度的评教和评学标准还需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阻碍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再审视

全国教育大会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德修养、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要求引导学生具备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习、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的素养，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树立学生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报国之志。

可见，高校要培养的绝不是仅仅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而是具备卓越综合素质、全面发展能力的未来社会创新者和领导者。他们或是引领前沿的学术大

师，或是治国兴邦的政治精英，或是创造财富的商界巨子，或是弘扬风尚的思想巨擘，但无一例外的是，大学教育给予他们的知识和技能造就了卓越的综合素质。

因此，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应从知识、能力、素质俱佳的阶段，迈向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并重的阶段，需要更加强调国际视野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更加强调能力、素质与人格塑造的结合。尤其面向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精英人才需求，要进一步突出能力和素质提升，更加强调批判包容思想与解决综合问题能力，更加强调全球合作思维与跨界领导能力，更加强调主动开创精神与灵活应变能力，更加强调好奇心、想象力与信息评估能力，以及更加突出思想品德和人格魅力塑造，这些也体现了全人教育思想的新发展。

（三）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再优化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相关的配套政策，使德育扬善、智育启真、体育健身、美育塑心、劳育立行相互促进，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讲，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就是要全面推进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路径、培养方式的整合与协同，推动各种办学优势向人才培养体系集聚转化。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 4 个方向有效突破。

1. 促进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人格塑造有机结合，树立全人教育的培养目标。高校应围绕全人教育的定位，强化整合性举措，着力培养具备宽厚基础、卓越能力、全面素质和健全人格的“时代高才”。重构人才遴选的标准和方法，提高招生的质量，选拔符合高校精神气质和能力素质要求的优秀人才，更加强调能力与素质，将人格塑造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推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交叉培养、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创新全员育人的培养模式。高校不仅要强调系统扎实的专业教育，而且要强化通识教育的功能。这种深度融合，主要体现在：一是推动专业基础课程与通识核心课程的结合，奠定学生宽厚的知识基础；二是推动专业培养与跨专业培养的衔接，培养学生独特的能力结构；三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造就学生良好的素质和人格魅力。

3. 加强课程教学、校内实践、社会实践、国际交流 4 个课堂的协同培养，构建全过程的教育生态圈。4 个课堂协同培养推动了开放创新、科教协同、跨界融合，整合了课内外、校内外和海内外的教育资源，彰显着紧密和谐的师生关系、

导学关系，形成了特色生态体系。通过 4 个课堂的融通，学生系统学习各类知识，获得课题研究、实践创造、团队合作、国际化等多方面能力的提升；教师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创建协同育人的多种培养环境；师生互动并共同实施教学和实践活动，有利于构建富有活力的教育系统。

4. 深化课堂教育、慕课教学、移动学习、网络平台创新互动，打造全方位的教学新体验。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教育教学模式的不断创新。高校应构建移动学习、虚拟学习的平台和环境，推动多种教育学习方式的汇聚融合，打造线上线下学习交互空间。进一步实现教育教学资源的充分共享，引领学习 2.0 模式下的教学方法创新，推动教学从知识为主转向能力为主，为自主学习、交叉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创造更好条件。

三、围绕人才培养三条主线，深化培养体制机制改革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牢牢把握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关键环节，紧紧围绕本科生教育、研究生培养和继续教育这三条主线，聚焦育人体系的优化和教育模式的创新，深化培养体制机制改革。

（一）建设一流的本科教育

实践证明，本科教育是高校成就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重视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行动，也是时代赋予大学的光荣使命。我国高校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首要的工作是坚持以本为本，构建一流的本科教育。

1. 促进联动协同，提升一流学科对一流专业的引领性。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是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一是发挥学科建设对专业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控制专业总量，优化现有专业，推动学科内的专业整合发展，鼓励同专业学生差异化发展。二是发挥学科建设对专业调整的方向引领功能。高校应结合学科评估等情况探索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布局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战略新兴专业、交叉复合专业，积极设置前沿和紧缺本科专业。三是发挥学科建设对专业教学的资源集聚优势。及时将学科建设的优势转化为课程提质、教师赋能、教材升级、教法改进的有效资源，以学科的交叉汇聚推动“通”“专”“跨”的培养模式，以全球一流学科伙伴的合作推动国际化交流学习方式，让学科育人蔚然成风。

2. 完善育人体系，提升本科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要求的适应性。高水平大

学需要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出发，系统优化育人体系，整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一是生源质量要“优”。高校应树立全面的招生质量观，将办学优势转化为招生优势，进一步完善招生工作体系和队伍。对接新高考改革，优化各类招生计划，做好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有效衔接，以更加有力的宣传等举措吸引更多优质生源。二是培养模式要“新”。高校应进一步加强学院协同，优化本科教育管理模式，建设一流学生社区。强化体育、艺术教育，突出养成教育和生活德育，深化“双创”教育。注重多元融合和个性化培养结合，不断强化分类别拔尖培养、跨专业交叉学习等形式。三是课程建设要“精”。高校应充分保障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基本载体地位，突出质量核心，完善课程内容、运行、学习过程管理、考核等标准，建立健全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等制度，重构高质量通识课程，推进课程提质计划。四是生涯指导要“好”。围绕海外升学深造、国家重点单位就业、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中央部委和各省市选调生等重点方面，高校应加强学生就业、深造等领域的资源整合和部门联动，进一步做好服务，分行业、分地区推进前瞻布局、前移指导、前置对接，做好后续追踪、关怀和支持。

3. 强化环境支撑，提升资源配置对人才培养的保障性。一流的本科教育离不开多元化的支撑保障条件。高水平大学需要从创新学习空间、改进质量体系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加大对本科教育的支持力度。一是打造新型学习空间。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创新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营造泛在开放的学习环境，使教学更加个性化、管理更加精细化、育人更加科学化。二是完善教育教学的质量评价和控制系统。高校应通过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以评促建、评建结合，自觉优化教育教学的质量标准，改进“教学-思政”二维和“院系-专业-课程（教师）”多级的本科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健全教学督导机制，强化学科、专业和教学工作评估，完善相应淘汰机制。三是优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高校应加大智慧教室、实验实践教学中心等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支持本科教育教学的政策、资源体系，逐步建立多渠道的教育教学投入机制。

（二）打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

高水平大学开展研究生教育，追求的是全面发展目标，培养的是创新研究能力，提供的是创新学习体验，倡导的是创新实践过程。研究生教育需要在学习与

研究互为一体中彰显研究精神，在学生与学者的角色切换中培育学者品质，在受教与创新的相辅相成中厚植创新基因。因此，打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必须从推进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科教融合培养体系、强化研究生培养效果等关键环节着手。

1. 以提升培养质量为目的推进研究生的教育教学改革。高校应建立适合学科发展特点的研究生教育教学方式，聚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和质量，突出研究生思想品德、专业素养、学业水平、科研能力、创新潜质的全面考察评价。一是通过改革完善招生方式。高校应树立分数-能力-特质并重的招生质量观，坚持学科主体，完善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科学公正的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推进本硕博连续招生机制改革。二是通过改革完善培养结构。高校应坚持顶层设计，以一流学科布局优化研究生规模和结构，逐步扩大博士生、专业研究生规模，打通学术硕士与博士培养阶段。三是通过改革提高培养质量。高校应坚持卓越标准，加强战略联动，构建研究生培养全球创新链接平台。

2. 以提升创新能力为重点优化科教融合的培养体系。科教融合是一流教育、一流科研和一流人才结合的战略选择，正是以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卓越教育。通过科教融合可以全面对接培养环节与创新环节，全程贯通学习过程与研究过程。一是加强部门协同，推进科教组织融合。高校应打通教育与科研的组织体系，建立支持科研融合的校内外组织架构，推行教学、科研职能部门定期研讨研究生教育问题的联席会议制度，促进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领域的要素流通。二是加强优势互补，推进科教资源融合。高校应贯通教育与科研的资源体系，发挥学科综合交叉的生态优势，围绕一流学科、关键技术、新兴产业的战略需求，加快培养工程博士，面向不同类型、层次研究生优化学科前沿课程和交叉培养课程。三是加强平台共享，推进科教能力融合。联动教育与科研的实践平台，强化研究生的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鼓励研究生担任助教和开设专业发展课程；强化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优化创业生态支持系统，加快推动创客空间建设，构建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3. 以对接重大战略需求为方向强化研究生培养效果。高校应紧跟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前沿，主动服务国家、产业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加强规划引导、政

策激励和组织协调，不断创新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升培养成效。一是以坚持立德树人根本，拓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校应以研究生党建工作为龙头，构建长效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科研育人为基础，强化导师团队立德树人的主体责任；以诚信教育为主线，加强研究生学风建设和科学精神培养。二是以牵手一流伙伴为载体，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高校应支持研究生联合培养、海外访学、科研合作，鼓励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加大力度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优秀留学博士生，加强国际师资和全英文课程及教材建设，积极探索中外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新模式新机制。三是以提升交叉汇聚为特色，推进多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高校应推进文理渗透、理工交叉、工农结合、医工融合等多形式的学科交叉，探索“医药+X”“工学+X”“信息+X”“文科+X”“农学+X”等多学科融合的人才培养方式，在招生计划、经费保障、资源投入等方面重点保障，进一步搭建交叉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平台。

（三）发展特色的继续教育

高校应主动适应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需要，按照“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和“讲规范、讲质量、讲效益、讲声誉”的要求，整合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开展高水平的培训项目，提高高端培训项目比重，着力提升继续教育规模和质量，形成打造特色继续教育品牌的合力。

1. 结合办学优势推进继续教育模式创新。高校应围绕办学特色与优势，特别是学科优势、专业优势与教学优势，打造高层次、高水平、高效益的继续教育。进一步发挥院系作用，强化院系在教学管理、人员管理、经费管理等运行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责任，进一步链接继续教育网络与高校校友网络，探索开环的继续教育模式。

2. 结合服务需求推进继续教育内容创新。高校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与地区热点，重点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围绕“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新兴热门产业建设，密切加强与政府和企业的联系，定制高端的继续教育培训项目。

3. 结合能力提升推进继续教育品牌创新。高校应进一步拓展学科、人才和社会办学资源，主动争取国家和省部级有重大影响力的高层次培训项目。应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体系、质量标准、条件保障机制，加强项目研发、课程设计以及

现场教学基地建设，提高开展重大国际化培训项目的能力。

四、调动人和组织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人和组织是育人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只有发挥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持续进行系统性的教育改革，最终建成以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一）调动人的积极性

教育归根结底是培养“人”的事业，人才培养的过程应是营造尊重人、关爱人、培养人、激励人的过程。调动高校人的积极性最为主要的是充分激发学生学习、教师教学以及两者之间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动力。

1.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学是青年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在大学期间，学生的第一任务就是读书学习。要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高校应进一步加强以下关键工作：完善培养平台，以学生为中心推动核心课程体系的优化改造；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选择权，完善“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跨学科教育”模式；积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提升自主学习能力；通过加强学习过程评价，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引导学生更加注重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和长远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最新信息技术，突破传统学习方式的时空限制，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2. 突出教师教学的主体性。教师是高校办学和育人的主体，是立德树人的关键。高校需要充分发挥教师投身教育教学的主动意识与主体作用。一方面，充分激发教师的教育教学热情。高校应重塑教育教学生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完善教学激励政策和表彰制度，广泛开展混合式、探究式、参与式教学，多维度考评教学规范、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改革研究等教学实绩，让教学实绩在聘岗晋升、评奖评优、薪酬体系中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常抓师德师风建设。高校应坚持以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对师德失范行为在职称职务评聘、评奖评优、岗位聘任中实行“一票否决”，引导广大教师充当人才培养“主体”、担当立德树人“主角”、聚焦教育教学“主责”、站好教育事业“主场”，为一流教育教学提供强大力量。

3. 完善教与学的协同机制。通过加强教与学的对话互动，引导和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将学生从传统教学的被影响者和接受者转变为新时代教学的参与者和

创造者。推进基于互联网、慕课和大数据的教学方法改革，实现教和学的联动协同自组织过程，通过情感隐喻来进行对话和体验式教学。

（二）调动组织的积极性

高校教育教学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必须要调动专业、学科、院系等组织的积极性，促进育人重心下移，扩大基层组织的教学自主权，不断改善教育教学的支撑条件。

1. 强化基层教学组织的自主功能。专业、学科等基层教学组织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单元，是人才培养的一线堡垒。高校应在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基础上，推动资源、权限进一步向基层教学组织流动集聚，发挥学科专业的主动性。通过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大纲、专业教材等各关键部分的改革优化，提升教学的质量与水平。

2. 落实院系的教育主体责任。高校应进一步确立院系的育人主体地位，明确院系负责培养目标、培养方案的规划和实施，加强对院系领导班子履行育人职责和人才培养绩效的考核。进一步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变革，推动管理重心下移，进一步优化院系教育教学的责任、权力和资源，形成学校为主导、院系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格局。

3. 提升高校保障、监督和评价能力。高校应构建统一领导、资源共享、开放合作的协同育人机制，强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氛围，完善教育教学的质量评价和控制系统，健全教学督导机制，优化学科专业和教学工作评估，建立校院两级教育教学的质量标准及淘汰机制。营造重视教育的环境氛围，改善人才培养的基础设施条件，加大教育教学资源投入，构建以师生为本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人才培养永远是高校根本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点工作。面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迫切需求，面对时代变革、未来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面对知识获取、传授方式的深刻变化，高校必须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核心目标与根本任务，以义无反顾的决心、行之有效的举措、强而有力的作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能力，为深化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加速我国“双一流”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3期

坚持“五个融合” 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

罗俊（中山大学）

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只有扎根中国，才能更好地迈向世界一流。这一深刻认识已经成为中国大学推动改革、创新发展的基本共识和行动自觉。

在推动大学发展的治理实践中，中山大学越来越理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深刻内涵。所谓“中国特色”，我们的理解就是要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属性，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治理模式和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育人目标。所谓“世界一流”，我们的理解是大学这一知识型组织具有特有的发展规律，那就是当今世界所有一流大学无一不是与自己国家民族发展历史紧密相连的。所以，中山大学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三个首先想到”的标准，即“国家首先想到、社会首先想到、学界首先想到”，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时代总会不断赋予大学新的职能，但纵观近千年的世界大学发展史，培养一流人才始终是大学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正是对大学这一根本价值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昭示。如何构建一流的人才培养体系，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是历史给我们教育工作者出的“时代考卷”。结合中山大学的工作实际，我从五个方面谈点理解和认识。

一、坚持德育与智育融合

大学阶段是青年形成和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阶段。高等教育“以育为本、立德为先”的理念，符合青年人成长的基本规律。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学生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增强辩证唯物思维、接受国情知识信息的关键载体，是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支撑课程。其次，“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支撑体系。思政课不能是独立的一盘一盘菜，而应该是炒菜离不开的这味“盐”，要融汇渗透到每门课里、每次课堂上。目前，我们已有 376 门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试点教学，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基本实现所有专业课程的全覆盖。

二、坚持学科与专业融合

我国“双一流”战略明确提出把建设一流学科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前提基础。

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是现代大学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突出特色。学科是特定的知识体系，专业则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学科建设是专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专业则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依托，更是检验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学科与专业都是人才培养的基本载体，具有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

近年来，中山大学根据学科发展总体布局，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学科与专业调整，凝练学科发展方向，强化学科与专业一体两面的关系。目前，全校 88 个专业都有支撑一级学科发展的明确任务，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更加清晰。经过“一减一增”调整，我们的学科结构与专业结构更符合一流人才培养的规律和需求。2019 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评选，中山大学 34 个专业入选，这个成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近年来紧抓学科与专业融合的改革实践。

三、坚持科研与教学融合

科教融合、科研育人是一流大学办学治校的重要理念之一。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奔腾而来，对大学输出创新人才、输出创新成果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推动高水平的科研创新优势与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相互转化，才能实现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用创新型人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科教融合的核心是解决“两条腿走路”的协同问题。近年来，按照“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学术前沿”的指导思想，我们摸索出大项目、大团队、大平台“三大建设”特色路径。我们自主投入近 20 亿元，开展“三大建设”，积极承担国家任务，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平台，科研创新能力和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科教融合的根本在于培育人才。首先，我们用五年的时间，把教授上本科生课程的实际比例从 67% 提高到 95%，同时建立了一支 200 余人的青年教师专任辅导员队伍，全部由副教授以上的优秀教师担任，加强学生的思想引领和学术引领。其次，推动创新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五年来，我们的本科专业开设学术前沿课程已经实现全覆盖。再次，拓展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实践的时间和空间。学校的科研实验室、科研基地向本科生开放，鼓励学生早进课题、实验室和科研团队，引导学生依托科研项目进行科学研究，领悟创新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

四、坚持本科生培养与研究生培养融合

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既要坚持以本为本，高度重视本科生培养；也要坚持以严治研，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更要坚持贯通培养，让更多的青年进入足够的培养周期，更多地进入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在维持本科生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我们抢抓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教育部的的大力支持下，加快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最新统计显示，2020 年有 65.2% 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我希望五年后这个比率可以达到 80% 左右。这样的变化重塑了学生整体向学求学好学的学风和氛围。

五、坚持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融合

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主阵地，课程体系是课堂教学的关键依托。近年来，中山大学把提高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完备性和竞争性作为育人体系改革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全覆盖地重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按照通识、基础、核心、提升四大类，完善第一课堂的课程体系；着力补足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课程设计，五育并举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素养。另一方面，加大第二课堂建设的支持力度，学校每年投入 2000 万元支持第二课堂重点项目，促进一二课堂的融合发展。

坚持“五个融合”，是中山大学塑造一流人才培养体系过程中遵循的方法和路径。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份子，中山大学坚持开放办学的理念，积极向国内外一流大学学习先进的办学经验，努力为世界高等教育交流互鉴、携手发展贡献自己的思考与探索。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必将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来源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智库观点”专栏

创新人才培养也是社会工程

管培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编者按：今天中国共产党 99 周岁生日。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大事，也是一项社会工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撰文阐述了这一观点。

各国工业化进程和世界科学技术中心转移的轨迹表明：创新型国家的显著标志是：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的主导力量，优秀人才高度集聚，大学由边缘进入社会中心。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根本在制度创新，关键在协同创新。抓住创新关键，我们就能保持战略定力，将挑战变机遇，育新机、开新局。

创新人才培养刻不容缓。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知识创新的源头，应当充分发挥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我们不必妄自菲薄，没有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和人力资本积累，就无法解释今天国家的发展。我们更不能妄自尊大，我们还没有足够资本高歌，所以，面对当前严峻挑战尤需理性。社会对大学的评说反映了人民的热切期待，高教战线需要更多激励反思，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俯躬衔命，全力以赴。

创新人才培养要全方位推进。创新人才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面向“天才少年”、优秀拔尖人才的创新人才培养；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创新人才培养。前者包括在后者之中，但具有特殊规律，我们的探索也一直在路上，如“少年班”、“元培班”、“实验班”等，但总体上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尚未真正破题。事实上，天才少年培养教育，基于因材施教理念，符合教育规律，也符合教育公平原则，更符合国家人才战略。所以，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要贯穿各级各类教育和教育的全过程。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教育科研深度融合。现行我国教育与科研体制的弊病，直接影响协同创新与创新人才培养。国家层面是大学与科研院所分离、产学研结合不畅；大学层面是学科壁垒、教学科研的张力。所以，要不失时机地推进科教体制改革，促进科教融合、产学研结合，推动校院、校校、校所、校企合作、协同创新。聚焦关系国计民生和重大科技进步的“卡脖子”环节，持续推进源头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结合。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张伯苓之问”、“钱学森之问”言犹在耳，习近平总书记的“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振聋发聩。我们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也要把我们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创新动能。创新人才培养更要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没有家国情怀，没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中国前途将不堪设想，遑论创新中国。所以，秉持价值理性、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创新人才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要以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这是任正非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远见。教师承担着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高校教师还是推动创新的主力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保证。要重塑师道尊严，不断提高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要为教师潜心学术干事创业提供平台，发挥大项目大平台和创新团队集聚人才的优势，吸引和汇聚优秀人才从教；建立高标准的教师教育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实施最严格的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强化激励机制，完善发展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高强度人力资本投入支撑。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曾指出，“创新能力对一国全球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才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才资本主义’时代。”高等教育人才资本直接关系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创新投入产出“性价比”高，但研发人力投入、科技人力资源培养水平等人员指标相对靠后。补齐“短板”，必须加大创新人才培养支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强度。一要显著降低大学生师比，二要加大人的投入，三要增加博士生规模。留住和培养优秀人才，扩大博士生规模无疑是重要选项。

创新人才培养必须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创新人才培养也是社会工程。高校办学长期面临体制机制性障碍。推动高校创新发展，“放管服”改革必须进行到底，因为高校终究是一个高度依赖基层学术组织和教师创造活力的学术机构。改革是可行的，因为大学组织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组织。要从编制、岗位、薪酬等具体改起，该放的放到位，该管的管到位，该服务的做到位。松绑减负，解放学术生产力。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释放学校活力”。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涵养创新文化。

全社会要形成鼓励创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制度文化。一是鼓励自由探索的浓厚学术氛围。鼓励学术批评、讨论争论，鼓励发明发现，培养好奇心、想象力。二是十年磨一剑的制度安排与学术文化。鼓励学者甘于清贫、耐得寂寞、潜心学问，激励原始创新，宽容失败。三是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坚持辩证思维，避免极端、偏激，坚决破除“五唯”，坚持实事求是，避免形式主义。坚持分类管理，各得其所，各展其长，为偏才怪才留出空间。

创新中国需要统筹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只是超大规模市场，未必形成“有效需求”；只靠政府力量，或将重蹈僵化老路，所以，推进创新还要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能够做好的，政府绝不干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外部性太强的事情，政府及时出手。充分发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政府出手也要遵循市场法则，如项目招标、“揭榜挂帅”，谁能干谁干，制度创新是创新中国的题中应有之意。

——摘自《人民政协报》2020年7月1日 06版

坚持“五育”并举 打造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

张荣（厦门大学）

13日上午，“2019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在兰州大学召开，厦门大学校长张荣出席年会并作报告。报告摘编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一、一流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养一流人才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决定着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创新能力，并最终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关系国家长远发展、根本利益的重要战略。2015年，国家印发实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

一流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养一流人才。作为社会主义大学，我们高校要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五育”并举，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坚持“五育”并举

“立什么德、如何立德，树什么人、为谁树人”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首要问题。高校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掘并把握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以德立人、以智育人、以体育人、以美育人、以劳育人，着力构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努力追求“五育”协同效应的最大化，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1. 坚持以德立人。立德树人、德育为先。高校要强化思想导航和价值引领，引导学生立大志、入主流，有大爱、树大德，讲奋斗、做奉献。厦门大学是一所有着优良办学传统的大学。自创办以来，学校形成了爱国、革命、自强、科学“四

种精神”。学校深入挖掘各类育人资源，把以“四种精神”为代表的厦大优秀文化纳入学生德育教育中，有效激活学生心中的精神基因，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2. 坚持以智慧人。以知识、实践、文化、艺术等启迪学生智慧，促进学生自主性、探索性、实践性学习，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近年来，厦门大学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探索出政策催动、地域联动、兴趣带动、资源推动“四轮驱动”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了以实验教学、实习实训、科创竞赛和社会实践为抓手的“一体四翼”实践教学新体系，探索以“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和“挑战杯”系列赛事为龙头的科创竞赛“两平台八化”模式，切实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学校在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获6金2银佳绩，金奖数和获奖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3. 坚持以体健人。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让学生在参与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中享受乐趣、强健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近年来，学校在开齐配足体育课的基础上，新开设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体育课程，其中攀树运动、橄榄球、潜水、帆船、赛艇、皮划艇、击剑等项目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特别是新开设的三边足球课，以其灵活性、趣味性和挑战性受到师生的喜爱，在模拟复杂、多边的社会环境的体育课程中，培养团队意识和集体精神。

4. 坚持以美化人。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美育的根本目的是人格的养成、灵魂的塑造。厦门大学围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厚植优秀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养成追求真善美的宝贵品质。学校注重环境育人和文化育人相结合，努力营造美丽校园，持续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汇演”，使环境美、文化美和心灵美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5. 坚持以劳塑人。弘扬劳动精神，培养学生在创造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增长见识、增长才干、勇于奋斗、锻造品格。厦门大学积极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氛围，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把劳动教育理念融入到社会实践教育中，使学生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良好习惯。厦大有一支研究生支教团，20多年来，数百名支教队员扎根“苦

甲天下”的宁夏海原县，克服困难，精心教学，有效提升所支教中学的初中升学率，帮助数十名学生考入一流大学，为支教学生募集各类捐款和物资近千万，帮助万名学生重返课堂。

三、紧抓“七个关键”

1. 努力培育引领未来的时代新人。人才培养目标是大学教育教学根本性的支撑。着眼于世界一流的目标定位，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特性。一是具有引领性。培养具有引领能力的民族精英，能够发展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和栋梁之材。二是彰显人文性。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还要具有高尚的文化品位，充满人文关怀，追求公平正义，养成健全人格，明德至善，懂得感恩，甘于奉献。三是体现时代性。培养学生能够与时俱进，积极主动地适应现代及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具有高效的学习力、敏锐的洞察力、充沛的创造力和果敢的行动力。四是注重开放性。不仅培养学生具有开阔的全球视野，而且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具备在复杂环境下驾驭国际事务的基本素质。

2. 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理念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从统一模式培养向个性需求培养转变。实现“三个转变”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确立学生在教育教学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充分释放和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厦门大学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努力推进“教”和“育”的平衡发展，提出学院“重育”、教师“乐教”、学生“爱学”，多措并举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3. 发展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迈入新时代，教育关系中的各种要素都在发生变化。教育教学的任务、方式发生着深刻变革，学生与老师、学校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都对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成为新时代的大学教师，首先要做到“四个相统一”，即：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在教育教学中，将知识传授、能力塑造、人格培育、价值引领融为一体，不仅帮助学生进行修业，更要引导学生好好做人。近年来，厦门大学在推动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发展方面做了努力探索。学校促进教研相长，完善教学基

层组织，组建了近 500 个教学课程组，近五年设立教研项目 299 项。发挥教师发展中心作用，加强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培养。形成了“教学比赛、教学研修、课程评估”三位一体的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模式。通过出版《我的厦大老师》、评选“我最喜爱的十位老师”等，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我校的潘懋元教授荣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韩家淮院士带领的“细胞生物学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4.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教育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受教育者的学习来实现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不只是习得知识，而是要提升学习的能力。一是要关注和重视体验式教学，特别是加强创新、创业、创造的“三创”教育；二是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课堂教学的效果，还要注意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三是在塑造学习能力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用一个模子、一把尺子来规范衡量学生，而是要针对每一个学生个体精心设计，把学生成长的路径选择权还给学生。近年来，厦门大学努力为促进学生学习创造和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环境。学校为学生提供了 500 多个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等创新创业空间。学生参与科创的人数不断增多，指导教师也不断增加，还有院士亲自指导学生科创活动。学生在国内外的高水平学业赛事中屡创佳绩。

5.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一流的教育不仅要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还要有一流的课程。要把握“学什么、怎么学、怎么评”三个关键点，完善课程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厦门大学提出“三个全面放开”，即：全面放开转专业、全面放开选课程、全面放开选教师，努力开设更多高质量的课程让学生选择。同时，不断优化大类招生培养、弹性学习年限、三学期制等制度，给每位学生更多选择权；进一步推动主辅修并轨，满足学有余力的学生需求；进一步推动本硕博贯通，给学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力推进本科生海外交流计划，拓展学生国际视野。

6. 促进科研资源向教学转化。一流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反哺教学，把前沿的科研成果及时纳入教育教学中。一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用科研引领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引导学生依托科研项目开展研究性学习。二

是探索科教、产教、国内外联合育人新机制。三是完善教学内容更新机制。四是建立各类创新平台向人才培养开放的长效机制。厦门大学拥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实力，全校建设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平台。学校发挥现有的各类科研平台和基地优势，将科技资源纳入教学活动中，让本科生能较早地接触学术研究、接受学术训练，重点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和学术研究能力。近年来，厦大本科学生的学术能力明显提升，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能力显著提高。

7. 健全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主要是致力于建立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将质量要求内化为师生的共同价值和自觉行为，形成质量立校的良好氛围。厦门大学这几年积极探索，大力推进改革，坚持“以生为本、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理念，建立了涵盖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过程、培养结果四个维度的“自我约束、自我检查、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校院两级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厦大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八大案例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唯一入选的案例。

——本文来源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智库观点”专栏